

博興文史資料



博 兴 文 史 资 料

第 六 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博兴县委员会
文史资料委员会编

滨州地区新闻出版局
一九九三年五月·滨州

EA97/35

博 兴 文 史 资 料
第六辑

博兴县政协文史委 编

邮政编码:256500 电话:321641

博兴县印刷厂 印刷

*

850×1168 毫米 大 32 开本 6.8 印张 14.7 万字

1993 年 5 月第 1 版 199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1000 册

*

鲁滨准印(1993)第 49 号

工本费:2.50 元

為民主，為科學，為振興
中華，為共產主義，奮鬥終生。

劉順元

一九六〇年三月五日

以史為鑑 振興

博興經濟。

張型魯

九三年五月

中共博興縣委書記

張型魯

題

發揮文史資料
在兩個文明建設
中的作用
一九九三年
賈學舜

原中共博興縣委副書記 賈學舜 題

目 录

狱中简记.....	刘顺元(1)
忆陈竹村与博兴抗日人民志愿军.....	郭鸿声(5)
铭刻在心头的两件事	肖津亭(15)
智取董王炮楼	王世让(19)

永远怀念烈士许连三同志	安家干 孙敬贤(25)
黎念兹小传	祁 东(32)
铮铮铁骨 宁死不屈	

——忆闫少梅烈士	孙英文 刘恩佩(37)
回忆我的革命家庭	张玉宝(43)

血海深仇 刻骨铭心——记常家庄惨案始末	
.....	肖荫桥口述 许中南整理(46)
麻大湖剿匪记	马作君(55)
血袭农会 罪孽难逃	高德魁 孙广义(58)
虎口救亲人	李增芳(62)

我所了解的赵炎周.....	<u>刘爱泉</u> (65)
历史是最公正的——回忆王绍堂同志	
.....	顾向德口述 刘希汉 刘金凤整理(67)
回忆在抗战时期.....	<u>刘宝地</u> (73)
抵制旧官府 义救高玉峰	杨统一(77)

除暴安良热衷教育的傅保清 安雷生(80)

简记旧博城商号 王长江 鲍友玉(85)

发展生产 支援人民战争

——记万兴成纺织合作社 ... 鲍友玉 王长江(88)

董永故里锦秋香

——记山东博兴酒厂 梁绍章 罗 兵(94)

五业兴旺溯渊源 魏华凯 朱庆胜(99)

曹王建安公司简况 马久成 曹宝福(116)

具有地方特色的利城醋 杨平春 高永昌(122)

历史悠久的张夏粉 郑希胜 侯清亭 朱宝祥(125)

博兴县京剧团述略 舒高福(128)

张王小学今昔 王爱正(134)

王博昌烈士纪念碑简介 王东升(137)

王博昌烈士遗文选 王东升辑(140)

蒲姑城小考 李少南(144)

汉孝子董永资料初探 舒荣先(147)

骆宾王与博兴 张基地(151)

闲云野鹤魏休庵 魏华凯(153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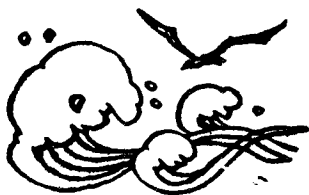
魏休庵作品选 云石芳 邢长忠辑(156)

忆博兴古迹北极宫 柳镇衡(159)

博兴剪纸 王鸣亮(165)

韩复榘轶事两则 白渡法辑(167)

抗日战争前的成建基	刘明耀 迟荣华(170)
群魔乱舞博兴城 下场可悲罪应得	韩春英(173)
政协博兴县委员会组织沿革与会议简况	白渡法 张基地 邢长忠(181)
附:《博兴文史资料》一至五辑目录	(207)
补白四则·文史资料与党史、地方志的区别(54)	
劝民种桑养蚕歌(115)	捉蟹(一)(127)
捉蟹(二)(169)	



狱 中 简 记

刘顺元

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，我三次被捕入狱。第一次在山东济宁被捕，经山东军法会审，宣布无罪释放；第二次在上海被捕，经苏州江苏省高等法院宣判无罪。本文写的第三次被捕，发生在1934年11月。当时我是中共中央上海局组织部干事，在法租界住所，于一个夜晚被捕，被搜出现钞六百元，文件两大箱，木皮箱各一。箱内有鄂豫皖、湘鄂西、满州省委给中央的报告，另有其它重要文件多件。在同一个夜晚被捕并一同关押在法捕房的，尚有张越霞、李世农等，连我共八人，都是在中央局各机关工作的。

综合被捕各种情况，我意识到问题严重，要坚定沉着地对付敌人的审讯。

在法捕房提审，我假托东北义勇军的身份，编造了一套口供，说我在义勇军任职，因事到上海，两只箱子是义勇军的朋友寄存的；义勇军内有人曾劝我加入共党，我不曾加入等等。这类口供是平时准备好了的，问起来对答如流，似乎相当地骗过了洋特务。这个口供的作用在于利用敌人的法庭，扩大党的政治影响；中国共产党领导着义勇军抗日。

在法捕房地下室关押了约一个月之后，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到特区法院，要求对我们同晚被捕的八个人向华界引渡。

法官逐个点名，一个叫陈雷的叛徒在场指认，说这个是老刘，那个是小李等等，同案难友胥照五骂陈雷：哪个认得你这个狗东西。

到上海市公安局后，我关在优待室，与陈同生在一个大木板铺上。第二天，从早饭到晚饭前，审讯了一个整天。国民党厉行自首政策，四五个叛徒特务，轮流劝降迫降，翻来覆去地说什么红军已经退出中央苏区，白区地下党遭受大破坏，共产主义不适合于中国，苏联要中国抗日是冒险等等。我忍住性子，推说文化低，理解不了这些国家大事。最后他们要新被捕的中央局组织部长、我的顶头领导、叛徒林国璋厚着脸皮来劝降，我说与他不相识，到此结束了这一天的审讯。

回到监号后，掺杂在犯人中的叛徒们故作窃窃私语，说什么上海的官司好打，南京的官司难受，中央派人到德国、意大利参观，单是剥皮的机器就有几十种。我控制不住自己，脱口而出地对着他们说：“你们说的这些，可能是真实的，但是有一件事你们不知道：这些剥皮机只能治狗，不能治人。”他们打了小报告，督察室把我提去，一个大特务面红耳赤，冷冷地问我：“你对这些自新分子有什么看法？”我说：“人各有志，他们有他们的看法，我有我的看法。”大特务沉默了一刻，忿忿地说：“你的问题到南京去解决，今晚就走。”我想我过分地刺激了他们，若非解送南京是已经决定了的事情，有可能我要吃些苦头。

监中无历日，寒尽不知年。1935年元旦前后，一批政治犯从上海解送南京。列车一开动，就响起了壮烈的歌声：“我们的旗子是红旗，红旗包裹着战士尸体，尸体犹未冷冻尽，热血淋漓涂满旗，高举鲜红旗，红旗飘满天，旗影闪闪下决一死战；怕死的东西，你们滚开吧，我们誓死守卫这红旗。”

到达南京宪兵司令部，我关在丙字监，同李世农同志隔一层木板墙，可以随便通话，两个人并肩战斗，结下了终生难忘的友谊。

国民党中央党部两次谈话，仍旧是迫降劝降，还是上海那一套废话，等于疲劳轰炸。最后他们叫喊：“你到底自首不自首？”我说：“我决不自首！”他们喊：“你是汉奸呀！”我说：“我没有丧权辱国，汉奸与我有什么相干？”从此，我的案件就转移到了警备司令部军法处。

1935年4、5月间，军法处提审。主审官李幼升说：“你的案子已经侦查完毕，很快要判决，你还有什么要说的？”我说：“人过五十，不为夭寿，我年过三十，五十去其大半，既然侦查完毕，法官判决好了。”李幼升说：“蒋委员长准备对日抗战，国家在用人之际，你们只要自己明白事理，还是有前途的。”我说：“我不相信国民党会对日抗战，国民党内战不已，政治腐败，人民水深火热，怎么能对日作战？”李幼升说：“现在华北形势危急，希特勒德国重新武装，国际形势也不好。”李幼升身为警备司令部法官，在法庭上当着政治犯说出这样的话，使我很久迷惑不解，难道亡国灭种之祸，也能使这种人良心发现吗？

军法处审讯情况似乎不恶，但还不敢说吉凶已经定局。又过了几天，点名解送国民党中央军人监狱，同时发给判决书：“刘顺元承认共党分子，复经张某证明，惟坚不自首，恶性甚深，依据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判处徒刑十年。本案不准上诉。”

到了伪中央军人监狱，我关在新字监，同年秋季调入字监7号，同监号的李丰平同志被捕后未暴露身份，判无期徒刑；林子明（李德昭）同志住隔壁8号，不久病故。他是长期关在宪兵司令部坚贞不屈的使我终生怀念的一个好同志。

国民党中央军人监狱政治犯管制极为严酷，但也不是铁板一块，教诲室的情况就是一例。该室负责人沈某准许犯人订阅《东方杂志》、《世界知识》、《大众生活》等书刊，这就使犯人有一定的了解国内外政治形势的机会。日寇节节进攻，全民要求抗战的浪潮滚滚向前，八一宣言、西安事变等一系列重大政治事变传到了军人监狱。然后就是七七事变、八一三日军在上海登陆、日本飞机轰炸南京，炸弹丢到了军人监狱。国共两党合作抗战，形势急转直下。

8月中旬，八路军南京办事处正式成立。中共中央代表团博古、叶剑英公开办公。各监狱的政治犯分批无条件释放。我于8月底出狱，到办事处报到，先见到博古同志，呈交了判决书。随即恢复党籍，参加了出狱政治犯的审查工作，而后奔赴敌人后方，参加了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工作。

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”，清队、审干、抓叛徒。由于我在国民党统治下三次被捕入狱，专案人员大作文章，鸡蛋里找骨头，害得我六年铁窗，妻离子散，后遗症至今尚在。历史的运转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，对林彪四人帮一伙，还有什么道理好讲？

死难烈士们永垂不朽！

刘顺元(1903—)，原名王学博，字溥泉。山东博兴县兴福镇城外王村人。1928年毕业于北师大英国文学系。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历任中共济南市委书记、江苏省委书记等职。1978年，当选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。在中共十二上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。已离休。此篇资料系刘老之孙王复翔同志提供。

——编者

陈竹村与博兴抗日人民志愿军

郭鸿声

“七七事变”，在民族危亡，国难当头之际，1938年春，在博兴党组织的领导下，全县第一个高举爱国抗日救国大旗，组织博兴抗日人民志愿军的是陈竹村同志。

在九十年代的今天，回忆陈竹村同志的伟大功绩，回忆这支部队的诞生发展壮大和她走过的战斗里程，来缅怀这位民族英雄，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和“博兴抗日人民志愿军”的主要发起人，以此对下一代进行革命传统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等方面的教育，是完全必要的，而且还具有现实和深远的历史意义。

1919年我出生于博兴陈户区东寨村，一个贫困的家庭里。从小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。我七八岁就跟父母要饭，并给城南滩上村的一家富农当过童工。我参加革命后的第二年，因歉收，取借无门，父亲被活活饿死了。

1938年6、7月间，听说为了抗日救国，本县拉起了志愿军。为了摆脱贫困求解放，我决心报名参军。我村离县城十五公里，在交通不便的情况下，为取保连跑三趟，最后一次才将村长写的保状交上，终于参加了志愿军。当时我仅18岁，没有文化，不懂道理，是一个不知东西南北的“毛孩子”。参军后，只有向领导请教，向同志们学习。开始因受旧社会“好铁不打钉，

好人不当兵”的陈腐观念的影响，当兵也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。可是自我参军后，蒙受各位领导的关照和同志之间的友爱帮助，特别是受到了陈竹村大队长的热情关怀。他经常深入班排与战士谈心，啦家常，问寒问暖，并给战士们讲故事，讲革命道理。我参军不几天，他找我谈话，先问我家几口人，多少地，生活怎样等。然后鼓励我“好好学习，坚决抗战到底”，劝我“不要想家，克服家乡观念，出来干事不要怕吃苦”。并说“只有抗战救国，穷人才能翻身，摆脱贫困求解放”。在领导的教育鼓舞下，在革命大家庭里过上了自由民主的生活，不仅温暖了我的心，也坚定了我干志愿军抗日打鬼子的决心。在此信念支配下，家长两次到城里叫我不要当兵，赶快回家，我都没有听。

一、根据我所知“博兴抗日人民志愿军”（下简称志愿军）是在博兴党组织的直接关怀指导下，在新五区“人民抗日自卫团”的基础上组建的。当时是一个大队的名称，陈竹村任大队长，刘西元、郑尧农任副大队长（郑后带少部分人自动离队），王博昌同志负责政治党务工作（因当时党的活动没公开，职务没明确公布），傅敦吾、李景房协助王博昌作些工作，王×干负责外交联络工作（外号王二瘤子，被错杀临朐五井），刘明泉任文书，张次钦（没恢复党籍）做司务工作，张焕艺兼军事教练员。大队下设三个排九个班，共约百余人。张焕艺、刘振武、柳春光、王汉卿（王涛）、张子新等同志分任正副排长。宋殿伦、王竹林、毛文光、韩枫、朱玉洲、杨永霖、王希圣、王怀荣、戴奎、赵星元、李益三、高××（打安丘高崖牺牲），张××等同志分任正副班长（此时张海邦、郝子乔、王仁三、陈璞如等十几位同志已选送鲁南学习）。该大队人员组成，除有二十人左右是干过旧军队，行伍出身的老同志外，大多数来自全县各区的进步知

识青年学生和一部分有觉悟的农民。他们都有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抗日保家卫国的要求。

二、我参军时，志愿军驻博兴城东门里，原师范讲习所大院内。其任务是配合抗日的友军担负城内的安全防守。防止反动派搞破坏，主要负责城南门和东门的防务。因驻城南小清河南岸湾头一带的反动派周胜芳部不断北来骚扰，经常发生冲突，互相射击对打。因他们搞磨擦，破坏抗日。为了搞好防务，争取主动，有时志愿军也到小清河去打几枪，吓唬吓唬他们。所以我们负责的防务任务比较繁重。因与反动派不断打仗，经常的短兵相接，弄得人心惶惶不安宁，同时也是对我们的实战锻炼。

三、为了提高军事本领，以应战时的需要，我参军后不久即换上军装，扛上了钢枪。每天早上跑步练兵。此时的陈大队长虽已五十二岁却也不甘示弱，以身作则，带头早起晚睡，跑步查哨查铺，对战士的关心体贴爱护无微不至，军事教练经常上军事课，使我们学习了不少军事常识。总之，生活搞得紧张、活泼，情绪愉快高涨，士气旺盛，朝气蓬勃。

四、为了活跃部队生活，还常开文娱会。活动多样化，会唱歌的唱歌，会演戏的演戏，有说有笑，好不热闹。马巨涛、相炜、刘明泉等同志还轮流演奏乐器。陈大队长还时常讲个故事，说个笑话，引得大家哈哈大笑。文娱生活搞得有声有色，别有趣味。这对巩固部队，稳定情绪，提高部队战斗力，起到了重要作用。

五、志愿军正在日益发展壮大之际，地方的几股反动势力（包括二、四区保安团，驻高苑的队伍）与周胜芳部串通一气，勾结起来，妄图对共产党领导的志愿军包围聚歼之，想一口吃

掉这支抗日的有生力量。在这千钧一发的危难时刻，志愿军与抗日的马保三部取得了联系。陈大队长当时虽然还不是一个共产党员，但他坚决遵照党组织的指令办事，迅速采取了机动果断的措施。有天傍晚七时左右，立即通知部队紧急集合，带领队伍出了东门，为免受敌阻向东北方向兜了个大圈子，走出三四里地又折回头向东南方向奔去。当晚出去几十里，不停地来个急行军，路经五区店子稍事休息后，直奔临淄苇子河。一路顺利地到达目的地，与山东抗日游击队第八支队（即马保三支队）胜利会合了。这是志愿军由发展壮大到战略转移的第一步，任务光荣而艰巨（据悉我们离城后的第二天晚上，周胜芳等反动派攻占了县城，与新三区等抗日力量打了一通，对我们来说，反动派是扑了个空）。

六、志愿军在苇子河与八支队会合不久，随大队移防长山县的焦桥（又称焦家桥子）。此次志愿军被正式改变为八支队特务二大队，其任务专保卫马保三支队司令部，这时志愿军（又称博兴大队）部队被改编以后，大队人员基本未动，只有少数同志作了调整，王博昌同志调八支队十三大队任政委。陈竹村仍任大队长，刘西元任副大队长，傅敦吾接替王博昌的工作。作为“博兴抗日人民志愿军”的名称来说，她的历史使命就此胜利结束。但她的任务并未完成，还有待继续努力。

七、志愿军改编前，为了提高大家的思想政治觉悟和民族自尊心，坚定意志，抗战到底。王博昌同志还常给我们上政治课，讲马列主义，讲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。怎样打败沙皇以及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经验，最终进入共产主义。讲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，是为广大工农劳苦大众谋福利、求解放的。指明当前必须全国大团结，枪口一致对外抗日。